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之我见

发布日期：2006-9-13 11:07:30

作者：郑爱文, 李敏

郑爱文¹, 李敏²

(1.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 宁夏银川750021; 2.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 宁夏银川750001)

摘要：“经济人”是经济学中经典而又常新的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的理解路径，引发出我们对现时代的经济人——道德人复合性主体应具有的行为特征及构建其的现实意义的思考。

关键词：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特征

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3-0113-05

一、对于“经济人”的理解

经济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武器，为了确立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解决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古典经济学家们把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强调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天生自由平等，并结合资本的经济职能和本性，把抽象的人假定为具有资本职能的经济人。古典经济学（17—19世纪）认为，经济人是具有自利动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一是假定人的经济行为具有自利动机；二是假定人们都能通过计算自由的依据利润最大化作出理性选择。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人性利己这一永恒的本性在人的任何活动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交往，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帮助别人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必须刺激他人的利己心，如要出卖自己的商品赚取利润，必须使商品购买者从商品使用中得到他们满意的效用。这样，自己的利益才能顺利实现；这样，就自然产生了共同的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的实现，只有在经济自由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自由竞争中，每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斯密把商品交换、分工协作、货币流通等经济现象都看成是从个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中产生出来的，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就是通过这种利己主义本性的一系列经济范畴来建立的。斯密认为，正是支配市场经济中自由贸易经济规律的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出于利己的动机和行为，实际上可以达到增进他人利益的目的。

在经济史上，古典学派的经济人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第一次抽象，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是第二次抽象，这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繁荣的阶段，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竞争代表着一种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过程，其中最大化行为可能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之行为的有效行为。通过斯密的眼睛，他们看到的市场是一个秩序井然、有效协调起来的体系，它产生于人们具有各自动机的行为，但又不是人们有意创造的。经济人的第三次理论抽象对传统模式的发展突出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二是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正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那种苛刻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要求，从而增强经济人模式的解释力，使其更具有一般的时代意义。

总之，信奉经济人抽象的经济学意义的理论家修正了某些传统表述，弥补了某些原有的缺陷，使经济人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不断丰富，其理论抽象也更贴近于时代。

二、从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

（一）解读“斯密问题”

经济人的假定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抽象出来的，不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现实的个人，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是又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的道德人或社会人。

人是一切社会属性的总和。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汲取道德观念的。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效的经济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伦理性，因为有效的经济行为可以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伦理目标，从而体现伦理的关怀和价值的追求。因此，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与道德是可以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正确理解这一关系，既是经济伦理的基本前提，也是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伦理基础。

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有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国富论》（1776年），以（经济人）“自私心”作为论证的前提；一部是《道德情操论》（1759年），以（道德人）“同情心”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两者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性，被称为所谓的“斯密问题”。“斯密问题”最初是由法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于19世纪中、末叶提出来的。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塑造了唯利是图、永不满足的经济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则描述了富有同情心、物质欲望容易满足、精神境界高尚的道德人。他们认为，这两部著作中人性的假设，反映了斯密思想中的深刻矛盾。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卢森贝，也认为存在“斯密问题”。如果人们仔细研究、正确解读斯密的经济人，就会发现他的“经济人”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在斯密的眼里，人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人的利己心与同情心作为一个相互对应的统一体共存于人的本性之中。跨越德国经济学家对“斯密问题”的误读，综合考证研究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指出人有两面性，一面是指人的自私自利和自我满足性，另一面指人具有同情心，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我节制的能力。人类的这种两面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斯密眼里，“经济人”并不是“单面人”。“经济人”是以理论抽象的方式来反映经济活动中人的本质特质的，它抽去了人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各种属性，只分析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质特质。经济人远未勾勒出人性的全部规定，它仅仅是市场行为人的理论抽象。道德人也是一种理论抽象。实际生活中任何人都是多重身份，并不存在某一种纯粹的“单面人”。经济人和道德人都是人的某一特性的抽象，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人的。

（二）全面、深入、辩证、历史地理解斯密的“经济人”

正确地看待、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关于斯密的“经济人”理论，一则现实的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二则它的提出正是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历史产物。

斯密的经济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其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放在一起思考，就会发现他阐明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类为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所驱使而又受理性引导的人性。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济人的活动场所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经济人的假设。如帕累托明确提出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人逐步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活动主体。

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表现：一方面极端利己主义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异化”加深，从而危及到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一方面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使人们开始由最初的单纯追求物质文明转向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精神生活的需要。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

“善”、“同情心”、“利他”是人的本性，“利己”也是人的本性。“利己”的私心源自于人的对物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漫长道路上，它是历史地存在着的。同时，经济人出于“利己”的理性行为，又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中儒教思想盛行的国家，那么儒教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呢？

（一）“经济人”的新教伦理基础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勤勉、认真、精心谋划，及按照节省的原则去获取利润的节俭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而促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形成的动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韦伯认为，新教徒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能被上帝蒙召和入选，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抛弃传统的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用一种积极的世俗创造活动，去争取自己获救的机会，追求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

（二）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竞争、和谐发展理念

韦伯认为，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可以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找到根源。妨碍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本身，也不是社会结构，而是精神性的儒家伦理。韦伯认为，儒教伦理对待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墨守成规，把人际关系和家族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轻视生产组织中的功利性的关系。而且儒家理论不鼓励人们追求物质上的利益，只是强调如何适应世界。因此，儒教伦理决定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 [1]（234）。

但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70年代日本经济的成功，人们开始重新反省和思考为什么具有儒家传统的日本会以其特有的经营气质和企业精神取得成功。80年代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和迅猛发展，使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非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据1996及相关

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新加坡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3%；香港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1%；日本实现了连续12年的经济增长（1961—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9.8%；韩国实现了连续11年的经济增长（1983—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8%。一些学者研究了如此骄人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结论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东亚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而且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显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从整体上说，已经是东西文化的结合体了，经过改造和创新后的儒家伦理文化，不仅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还能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获得新生。儒家学说作为东亚社会现代化可能的精神源泉，是因为儒学中具有天人合一式的终极关怀与义务型的伦理规范。

（三）经济人——道德人复合性主体的特征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阶段，但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批判地继承东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既注重效率又追求精神道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复合体。

1. 塑造经济人——道德人的现实基础：制度性安排。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为所欲为，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法律制度的约束下，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的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要注重制度性安排，把中华民族道德中的优良传统和市场经济原则中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品质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中，但这种结合是需要制度性安排作保证的。如对个人合法收入的法律保护、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制度规定、约束商业欺诈的有关法律制度等。其实，整个规范的过程贯彻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塑造成遵纪守法，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注重效率的现代人。

2. 经济人——道德人的行为特征。第一，具有自强、自立、自主的精神，充满创造力。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重人伦依附，轻独立自主的社会，这使人的个性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创造性才能遭到泯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要弘扬自强、自立、自主精神，突出主体的地位，张扬个性，发挥个体的潜力，激发人们的创造性，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第二，求真务实，崇尚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以“求善”为核心的道德理性，而在现代经济中，我们不但要“求善”，还要“求真”，即追求科学的原则和理性的精神。“科学”、“民主”、“法制”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三条法则，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我们培养的行为主体是具有较强的认识能力、选择评价能力、活动能力、富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人。第三，具有正确的义利观。我们提倡的义利观是“义利并重”的价值观。一方面是以法律规范规定合法合规合理的“利”的范围；另一方面，人在社会生活中除了物质利益以外，还要有义，在社会经济水平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义”不是一个虚幻的道德概念，杜绝损人利己、尔虞我诈也是由法律制度等规定来制约的。所谓义与利的结合，一方面是保证人们合理的“利”的行为的行使，另一方面是保证“不义”行为由相关的制度性规定来防止和杜绝。第四，具有新集体主义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整体本位的道德文化。社会利益或者群体利益是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衡量人们行为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过分强调整体利益的至高无上性，会侵蚀和扼制个人的利益和个性的自由，把个人的正当权益都压制到了一个不能再小的空间里，有时甚至是否定了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益。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当企业中的劳动者成为真正平等自由的主体的时候，由他们所组成的整体，才是真正的集体。在这种“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2]（84）。这种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新集体主义，其前提是个人利益不能受到根本性侵害，个人的人格和意志不能受到致命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在集体中的所得，会大于作为一个个人去奋斗的所得。只有这些必要条件都能够得到满足，集体中的个人才能为集体着想，自觉地服从和维护集体的利益，并为集体的利益不怕吃苦、甘冒风险，甚至必要时自愿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就是现代新型的集体主义。我们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个人的利益、自由和完善，这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

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思考的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命题提出来，分析其发展历程，找出其值得弘扬和发展的地方，目的是充分利用其有利于刺激人们的创造力、积极发展生产力的因素，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如自主、独立、进取、公平、民主、竞争、法制都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所需要的精神。正是由于经济人的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精神，才有了共同的集体利益，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注重效率，强调时间观念，强调投入产出比，才有了整个社会的高效率。如果说经济人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的概念，是由于物的缺乏的时代而造就的人们对物的占有的特性，那么道德人则是对人的较为全面的要求，因为人除了物的满足外，还需要有精神的满足。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都有伦理道德上的需要，社会是人进行活动和实践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只有在这种客观条件和环境中，人的活动和实践才得以进行，作为人的人性才能得以实现[3]（191）。“道德人”的精神构建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刚刚起步，与国外相比还尚待完善，这时既要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加强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人们所需要的行为主体必须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是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发展须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物的依赖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等发展阶段[4]（104）。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三形态思想”，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

联,属于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逐步向人的全面发展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经济人的精神去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规模增进物质财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人精神又为人的自由发展和民主、政治创造了条件。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是已由“依附型”走向“独立型”的人,是既注重效率、竞争,又顾全各种利益的协调和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人,是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的人,是具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的人,是在良好的制度下,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

参考文献:

- [1] 章海山.当代道德的转型和建构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3]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刘茂海】

Reflects on Economic Person in Economic Condi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ZHENG Ai-wen¹, LI Min²

(1. Economy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2. Branch of Ningxia, Construction Bank of China,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person”, as a classic and new topic,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economy for a long time. Und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ad from “economic person” to “realistic moral person” triggers our reflections of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through train of thought from economic person to realistic morals person.

Key words: economic person; moral person; economy of socialist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f behavior

本网站由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维护制作

All copyright © 2005